

2014年浙江省社科联立项课题

“基于田野调查视阈的浙东民间吹打乐研究”(2014B0878)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丛书

浙东

丁丽君著

民间吹打乐研究

FEIWUZH I WENHUA YICHAN YANJIU YU BAOHU CONGSHU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概念阐释与研究叙事	(006)
第一节 概念阐释	(006)
第二节 研究叙事	(011)
第二章 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态	(018)
第一节 自然环境	(018)
第二节 人文生态	(022)
第三章 田野调查与个案举要	(034)
第一节 奉化吹打	(034)
第二节 宁海锣鼓	(040)
第三节 象山锣鼓	(044)
第四节 余姚锣鼓	(049)
第五节 镇海锣鼓	(053)
第六节 舟山锣鼓	(058)
第七节 嵊州吹打	(062)
第四章 代表传承人与传承曲目	(068)
第一节 代表传承人	(068)
第二节 传承曲目	(094)

第五章 音乐分析与社会形态	(177)
第一节 音乐分析	(177)
第二节 社会形态	(184)
第六章 经济供养与保护现状	(187)
第一节 经济供养	(187)
第二节 保护现状	(191)
第七章 存在问题与发展策略	(202)
第一节 存在问题	(202)
第二节 发展策略	(208)
守望的坚持：绿叶对根的情意	(213)
参考文献	(217)
后记	(221)

绪论

近年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政府主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在政策法规制定、保护工作规划、普查工作开展、名录体系建设、保护机制完善、保护政策落实,以及信息化保护和宣传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2005)、《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规定》(财政部、文化部,2006)、《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2007)、《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等政策性文件和法律法规,启动了《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认证、抢救、保护和研究工程》(2002)、《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3)、《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3)、《濒危音响档案数字化》(2003)、《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证和命名》(2005)等项目,对于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了指导性意义和政策保障的作用。

截至2011年,我国设立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迪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普查出87万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已有

7 万项进入各级保护名录。其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028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109 项、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8186 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3776 项。已经公布和确立三批共 1488 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332 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可以说国家+省+市+县的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已经建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近年来,有多个地方的吹打乐相继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表明吹打乐得到国家政府的重视,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吹打乐是中国传统器乐乐种,指由吹奏乐器、打击乐器演奏的音乐,民间有“鼓吹乐”“锣鼓乐”等称谓。中国的民间吹打乐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分布广泛,在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作用,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和重要表现。

浙东民间吹打乐,也称“浙东锣鼓”。自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以来,便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丰富的演奏内容、多样的表演形式深受民众喜爱,在民间广为流传,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文化传统。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是作为一种音乐类别,浙东民间吹打乐始终伴随着浙东地域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不断繁衍、传承和发展。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艺术观念的冲击、社会战争与“文化革命”的影响,以及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的浪潮,浙东民间吹打乐这一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遗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的荒腔走板,有的濒临失传。不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看,还是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阈说,对浙东区域长期以来由其共有的、特殊的民族属性、风俗习惯、语言特征、文化背景、经济条件、生存方式等,所形成的吹打乐文化现象、乐器和器乐、音乐作品与表演方式、场合范围、音乐家群体、个体音乐实践、音乐思想生成、发展和变迁做系统深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课题以浙东民间吹打乐为对象,在梳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取活态现状的视角切入,综合运用文献法、调查法、历史分析法等,从历史与现状、本体分析与文化解读入手,对浙东民间吹打

乐艺人及传承人情况、主要活动内容、主要活动方式与重要活动项目、民间吹打乐的技艺传承方式(师续、父子、父婿、乐师等)、民间吹打乐收藏乐器、乐谱和其他资料、民间吹打乐的艺术成就(对乐种传承中的贡献、对浙江省音乐文化的贡献及对国内外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系统的研究;立足于历史文化的整体背景,围绕浙东鄞州(原鄞县)、奉化、象山、宁海、余姚、镇海、舟山以及嵊州等地吹打乐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班社艺人、活动范围、传承曲目、经济供养、传承现状以及发展保护等进行深入的考察;梳理浙东吹打乐的乐种属性和音乐本体特征,解读浙东吹打乐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在社会结构中呈现的动态特征,分析判断浙东吹打乐的社会定位和生存态势。

本课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指导,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承接。具体的研究和写作中,采用历史学、生态学、文献学、考古学、个案调查法、音乐人类学、文化学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从史料、文献记载中探寻浙东民间吹打乐的历史渊源,同时对前人的实践与研究进行调查分析和整理,进而做出总结和补充;另一方面,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浙东民间吹打乐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域、各种场合的形态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揭示出浙东民间吹打乐生成的历史成因和内在的本质规律。

由于浙东民间吹打乐在历代的文献史料中很少有关于它们产生、发展、衍变以及传承方式、艺术特征等方面的完整记载,其世代传承的古谱也多散落在民间艺人手中。因此,浙东民间吹打乐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进行大量深入的实地田野调查。广泛挖掘整理与浙东区域民间吹打乐相关的文献资料、深入浙东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力争获得有价值的音像、图片、文字、音乐考古实物、文献书谱资料等,据此建立浙东民间吹打乐基础数据库,撰写出各个板块的生态调查报告。其次,将浙东民间吹打乐置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中考察,基于田野调查和文献追踪的材料,对浙江民间吹打乐的生态现状进行理论分析与归纳,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并提出有效保护和研究浙东民间吹打的相应对策。在借鉴学习国外

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地理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进一步开掘浙东民间吹打乐的历史意义、文化价值和现实价值。再次,注重浙东民间吹打乐的历史演化过程。从发展变化的观念去把握研究对象是本课题研究能否取得实效的必由之路。我们在尊重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努力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纳入我们的论域当中,试图实现宏观和微观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就是为了尽可能地还原浙东民间吹打乐的存在方式。

正如《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①我们认为,对浙东吹打乐的系统研究,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有效地传承和弘扬浙东吹打乐文化。对浙东民间吹打乐的保护与研究,并不是因为其独特的音乐属性,而是因为它们承载着浙东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知,自我标识的最好凭证,同时,也是建设浙江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的具体体现。本研究可给各级各类政府部门提供翔实的浙东民间吹打音乐文化史料,对有效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文化,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广泛的社会效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浙东民间吹打乐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浙东民间吹打乐后继无人,参与人数下降;另一方面,受城市化进程影响,民间吹打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因此,对浙东民间吹打乐生态现状展开调查,研究与保护,迫在眉睫,一旦消失,便不可复制与再生。

无论从世界和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的视角看,还是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的视阈说,浙东民间吹打乐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作为文化专题,浙东民间吹打乐研究是全面展示浙东民间吹打乐文化面貌的窗口,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的浙东人民,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创造精神和自觉的审美意识,挖掘出浙

^① 国发[2005]42号。

东人民的艺术智慧和音乐贡献,向世人展示浙东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食粮的创生者;浙东民间吹打乐研究可为进一步申报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建立浙东民间吹打乐保护区提供参考,为梳理、弘扬浙东音乐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丰富浙东的先进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浙东民间吹打乐研究是我们深入了解研究浙东文化、创新发展浙东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不仅可为我们研究浙东历史文化、浙江音乐历史文化乃至中国音乐文化提供重要的史料资源,而且这些史料对浙江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也起到了积极的验证和校勘作用,为中国音乐通史今后的修订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本课题以浙东民间吹打乐为对象,认为对区域乐种文化现象的研究,不仅要地理和历史联系起来,注意区域的历史文化现象和空间分布的异同,而且还应该注意历史文化现象的自然人文环境。区域社会和区域历史意义上的浙东,其时空跨度均大大超越了行政区域意义上的浙东。本研究着眼于把浙东民间吹打乐视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亚文化系统,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切入和立论,对其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音乐现象、乐器和器乐、音乐文献、音乐作品与表演方式、场合范围、音乐家群体、个体音乐实践以及音乐思想生成、发展和变迁等做系统的深入研究,其创新主要体现为:1. 深入挖掘、梳理、分析和发现与浙东民间吹打乐相关的史料,这对于完善和补充浙江音乐文化、丰富和发展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来说,不论是选题、立意,还是史料创新,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2. 运用文化生态学方法,对浙江民间吹打乐展开整体、综合的理论把握和个案、详细的实践考察,关注体现浙东民间吹打乐发展的历史特征、传人传谱和音乐审美价值取向,揭示浙东民间吹打乐形成与发展的依据和包蕴的文化内涵。3. 把浙东民间吹打乐纳入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通过与浙东民间吹打乐与浙东民间风俗关系的阐释,彰显出浙东民间吹打乐的地域特色和独特贡献,凝练出浙东民间吹打乐的个性风格及共性价值。

第一章 概念阐释与研究叙事

先秦思想家孔子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浙东民间吹打乐研究首先应对其核心概念做出阐释，对其已有的学术基础做出交代，这是本论题研究的重要基石。本章着重梳理浙东民间吹打乐的相关概念及学界已有研究的学理之路，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理论参照。

第一节 概念阐释

一、区域视野中的浙东文化

浙东，依据字面的理解应当指浙江东部，这也是《常用缩略语词典》（1987年12月第1版）的解释。浙东这个区域词的内涵不仅具有地理学、行政学的意义，而且还具有社会学、文化学的价值。作为一个典型的区域概念，浙东的范围在古代文献中是一个含义广泛、语义变化不定的模糊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所指范围也有所不同。

浙东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唐代的道制，即以钱塘江为界，设有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明代以后从学术到文学，钱塘江常被学者作为划分区域的界线来使用，浙东、浙西的分野似乎更为明显。就现在的行政区划而言，严州、处州已不存在；金华、衢州属浙中；温州属浙南；绍兴、宁波、台州则属浙东。

文化(culture),是人们广泛使用的词语,包含丰富的人文意蕴。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学界对其定义可谓汗牛充栋、莫衷一是。足见要给文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并非易事。初步统计,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有300余种。比较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有: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文明,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合体”^①;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布莱斯蒂德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词语,这里用作更为广泛的社会学意义,即是说,用来指作为一个民族社会遗产的手制品、货物、技术过程、观念、习惯和价值。要之,文化包括一切习得的行为、智能和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以及经济的、道德的和精神的的价值系统。一个特定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它的法律、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和教育”^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说:“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③

“文化”在汉语语境中最早渊源于《周易·贲卦·彖传》中的“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将“文化”作为一个词正式使用最早出现在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曰:“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近代以来,也有许多学者对文化做出界定,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而现代《汉语词典》中则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④

① [英]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生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01.

② Paul. J. Braised, Cultural Cooperation Keynote of the Coming Age, New Haven: The Edward. Hazen Foudation, 1945: 6.

③ [加]夏弗. 文化: 未来的灯塔. Twickenhan: Adamantine Press, 1998: 28.

④ 王威孚,朱磊. 关于文化定义的综述[J]. 江淮论坛,2006(01).

如上所言,尽管文化定义和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文化是人化,不仅指物质文化,而且还包括精神文化。

所谓浙东文化,顾名思义,是一个区域文化概念。而区域一般来说,是从地理学、文化学和行政学等诸多层面,综合考虑若干种相关要素,即以地理环境、民族、文化、语言、行政区划等方面的特征为依据,来划分和界定区域社会的。按照我们的理解,区域社会就是建立在一定的地理条件基础上的、具有其独特文化和风土民情特征的、相对独立的地域性社会体系。因此,每个区域社会都具有自成系统的、相对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语言、风俗、经济和政治的结构,以及建立在上述结构基础之上的区域的共同传统。



本课题研究区域范围图①

① 方贤峰. 浙东传统民居建筑形态研究[D]. 浙江工业大学, 2010: 13.

所以,无论历史上浙东区域如何变化,也无论文化定义如何多样,浙东文化都是中国的一个在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方面均极有特色的区域文化,浙东文化中包括的浙东民间吹打乐是中国一个特定区域的音乐文化。据此,我们可以把浙东民间吹打乐理解为一种地域文化形态,如同浙北文化、浙南文化等,都是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如此一来,我们今天讨论浙东民间吹打乐主要是指宁波、绍兴、舟山、台州为核心区域并由之衍化出来的浙东吹打乐文化概念。但从历史研究的视角看,浙东民间吹打乐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浙东核心地域中的早期文明,如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甚至随着新遗址的考古发现可能还要往前推。

此外,任何一个地方文化的发展除了地理文化的孕育之外,还有战争、人口迁徙、文化交流等因素的作用。浙东作为滨海城市,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为显著。因此,在研究探讨浙东民间吹打乐时,除了探索传统文化的承续之外,也应该把外来文化的影响纳入思考的范围。

二、文化视野中的浙东吹打

民间吹打乐,也称锣鼓乐、鼓吹乐。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产物,民间吹打乐是各民族民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劳动生产和生活实践,创造、传承下来的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地域色彩的音乐品种的概称。作为一种音乐品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民间吹打乐始终伴随着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不断繁衍、传承和发展,成为深受民众喜爱的艺术品种,在民间广泛流传,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社会精神效应。

中华民族辽阔的疆域、多元的民族和悠久的历史共同铸就了多样、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样式,它们是民族智慧的标识、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也是构成民众生活的重要部分,往往反映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民俗风情、社会意识、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等。如浙东锣鼓以多鼓与十面锣为特色;安徽花鼓灯以挎鼓演奏与狗叫锣的特殊音色和用法为特色;山西太原锣鼓以钹与镲对奏为特色;苏南十番鼓以同鼓、板鼓的鼓段独奏为特色;土家族打溜子以头钹、二钹的独特音色与前后拍快速交替演奏为特

色；潮州大锣鼓以多面斗锣和独特而优美洒脱、威武粗犷的司鼓技艺为特色等等。这些构成了色彩斑斓的中国民间吹打乐。

从演奏曲目和演奏风格来看，中国民间吹打乐又分“粗吹锣鼓”与“细吹锣鼓”两类。粗吹锣鼓，乐队常采用唢呐、管、长尖等粗吹乐器和大锣鼓等粗打乐器，声势浩大，雄壮热烈，曲调少用细致装饰，风格粗犷。代表性曲目如十番锣鼓中的《将军令》、晋北鼓乐中的《大得胜》等；细吹锣鼓，常用竹管主吹并配以大锣鼓，有时吹中辅以丝弦，代表性曲目有浙东锣鼓中的《万花灯》、十番鼓中的《满庭芳》等。

民间吹打乐的演奏形式一般可分为“坐乐”与“行乐”两种。坐乐演奏于室内，行乐演奏于室外，特别是在道路上行进。坐乐与行乐不仅方式不同，而且所奏乐曲也有所区别。如福建十番，其坐乐队列以吹管乐器辅以弦乐在堂前呈八字形摆开，所有锣鼓打击乐成一字形坐于堂后；而行乐队列则排成两列纵队，锣鼓打击乐在前，吹奏乐在后，不辅弦索；再如西安鼓乐，其坐乐每奏全套，所需时间很长；行乐一般只奏全套的部分，所需时间较短。另外，坐乐、行乐的座次队列也有所不同。

浙东民间吹打乐，作为传统音乐的一种存在样态，是指广泛流行于浙东境内的民间器乐演奏形式，也是区域音乐文化的一大支脉。尽管与其他民间吹打乐不同，但也有共性特征。首先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独立的艺术形式，而是在世代传承中依托于劳动、宗教祭祀、婚丧嫁娶等活动而存在，具有广泛社会学意义的价值体系。它不仅与广大民众的生产实践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而且还与当地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性密切相关，彰显着整体的音乐认知观、人生世界观。这些观念展现了鲜活的“生活世界”，让人们在获得音乐享受的同时获得其他社会知识。其次民间乐手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往往是在父母、师傅、同伴那里通过“口传心授”习得。再次民间吹打乐的发展过程还体现出创造性地改编、再创造，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各大流派。如此不断发展、不断延续，民间吹打乐获得了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最后是民间吹打乐音调与地方语言结合紧密，不仅简明朴实、平易近人、生动灵活，而且还具有浓郁乡土特色和广泛的群

众基础。它们反映着历史的记忆、陶冶民族的性情、滋养着文化的土壤、孕育着发展的动力；它们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文化交流的纽带、民族习性的显现、精神文化的标识；它们不仅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固有基质，而且彰显出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二节 研究叙事

民间音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吹打乐在民间音乐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国内外各民族丰富多样的民间吹打乐，既是各民族的精华，也是全人类的财富，浙东民间吹打乐也不例外。他们都是传统音乐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一、相关成果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深入推进，许多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民间吹打乐研究，在民间吹打乐生存背景、音乐形态、存在方式、活态现状、传承发展，民间吹打乐的地理分布，与民俗生活、民间信仰、民族审美等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

袁静芳教授在《20世纪中国乐种学学科发展回望与跨世纪前瞻》^①一文中，分析了民间乐种收集保护和抢救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应该置于一定的民俗、祭祖仪式中对乐种进行考察和研究的思路。不仅如此，她在多年的民间器乐等研究成果中，也多涉及民间乐种及传承保护问题的研究。

乔建中欣赏了1984年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打击乐讲师李真贵和他的部分学生演出的“中国打击乐”专场音乐会后，写了《锣鼓艺术 别有

^① 袁静芳. 20世纪中国乐种学学科发展回望与跨世纪前瞻[J]. 中国音乐学, 2000(01).

天地——听“中国打击乐音乐会”有感》^①一文,对吹打乐的创造性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薛艺兵在《民间吹打的乐种类型与人文背景》^②中对吹打的源流、种类、民间吹打班会及吹打的社会功能作了深入研究和探讨。蒲海《论中国民族打击乐的继承与发展》^③从中国锣鼓乐的历史发展轨迹和中国民族打击乐的继承与发展两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认为要做好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人才的培养与造就,民间吹打乐才能更好地继承,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力求表演形式的多样化、不同地区锣鼓乐的相互借鉴、群众性鼓乐活动的普及与推广这四个方面进行发展创新,才能将民间锣鼓乐发扬光大;张伯瑜《中国民族器乐概说之三——形式多样的民间合奏乐种》^④介绍了潮州弦诗、福建南音、河北吹歌、山西八大套、鲁西南鼓吹乐、辽宁鼓吹乐、十番锣鼓、浙东锣鼓、西安鼓吹、潮州大锣鼓十种吹打乐的流行地域、乐队配置、乐器乐曲等的特征;李作方《简述中国民间吹打乐的源流及其分类》^⑤梳理了中国民间吹打乐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在各个时代的特征。

许璐、蔡际洲的《1980年以来的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刊载于2009年《音乐探索》第一期。文中通过对1980—2006年期间发表的156篇相关论文的研究,得出“音乐学界对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的关注度还有待加强”的结论。文中认为检索的156篇文献从地理属性上可划分为多区域研究和单区域研究,南北地区相比,音乐学界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从研究角度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单一研究角度和综合研究角度。从研究方法进行分类,有田野工作法和案头工作法两种方法。从研究对象的大小进行分类,可分为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两种。作者关于汉族民间吹打乐的研究现状概括了五大特点:1. 音乐学界对汉族民间吹打乐的研究呈上升趋势。2. 研究中所涉及的地域来

① 乔建中. 锣鼓艺术 别有天地——听“中国打击乐音乐会”有感[J]. 人民音乐, 1985(02).

② 薛艺兵. 民间吹打的乐种类型与人文背景[J]. 中国音乐学, 1996(01).

③ 蒲海. 论中国民族打击乐的继承与发展[J]. 中国音乐学, 2013(02).

④ 张伯瑜. 中国民族器乐概说之三——形式多样的民间合奏乐种[J]. 乐器, 2007(12).

⑤ 李作方. 简述中国民间吹打乐的源流及其分类[J]. 艺苑, 2008(12).

看可以发现北方多于南方,东部多于西部,在海南、贵州、云南、台湾,以及港澳等地,吹打乐的研究仍旧是空白。3. 单一研究角度在研究中占有较大比例,其中本体研究和阐释研究是音乐学界的首选。4. 案头工作的研究方法是目前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的主流。5. 从研究对象的大小可以看出个案研究所占的比重较大。认为“乐种”“吹打乐”等几个常见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布、研究角度、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的关系等都值得深入探讨。诸多的民间吹打乐研究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提到,我们不再一一赘述。

针对浙东民间吹打乐,刘燕与杨海宾《浙东地区民间吹打乐探微》认为,“浙东吹打乐演奏以锣鼓音乐为主要内容,以‘五锣’为主要形式,由五人专奏锣鼓”^①。这种组合音响十分丰富,表现力很强。作者从艺人老龄化、新曲目匮乏、演出场次缺失等方面分析了浙东吹打乐存在状况式微的原因。主张将浙东吹打乐与中小学结合、与大专院校结合、与年轻人结合,充分发挥年轻观众的参与性、扩大受众面,改善观众及艺人老龄化的现象。对于传承与发展浙东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廖松青《“奉化吹打”辨析》指出,作为“浙东锣鼓”的重要构成,奉化吹打乐是“浙东锣鼓”的流行地,根据《板桥杂记》和《陶庵梦忆》可以推断奉化吹打盛行于明代中叶。该文将“奉化吹打”还原到祭祖仪式中,对它的内涵进行辨析。作者通过在浙江省奉化市棠云乡汪家村进行田野调查,了解祭祖仪式包括庆祝大典、拜观音忏、巡游、做戏、放焰口等环节。祭祖仪式中吹打乐的使用频率较高,是整个祭祖仪式主要音声类型,在祭祖过程中有大吹、合吹和细吹三种不同的乐器配置。“20世纪70年代末,曾有学者将宁波地区的民间器乐的乐人按照其乐人身份,将其分为三类。一类是非职业性业余民间乐队,一类的由堕民组成的以“班”命名的职业性的民间器乐组织,还有一类是半职业性的组织。”^②通过田野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对比,可以发现1949年之前存在以堕民组成的“唱班”,以及由宗族

① 刘燕,杨海宾. 浙东地区民间吹打乐探微[J]. 大众文艺,2013(21).

② 廖松青. “奉化吹打”辨析[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6).

子弟组成的、抬“鼓亭”或“纱船”演奏的“会”“社”。奉化吹打乐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队列行进式，另一种为室内坐奏。随着社会的变迁，“堕民”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唱班”这样的职业吹打乐班依然存在。作者将奉化吹打乐还原至仪式中进行分析，不仅是为了梳理其名称下所隐含的历史脉络，更是为了对某些习以为常的音乐观念有所反省。对于奉化吹打乐，傅珠秀《奉化吹打》认为，“奉化吹打分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队列行进式，主要适用于婚嫁迎娶、迎神赛会、行会、出丧等动态场合；另一种是室内坐奏，主要适用于祝寿、满月酒、祈祷、庙会、祭祀、做七等静态场合。乐队编配上以吹管乐、丝弦乐、打击乐三者合一，乐手众多，一般为十三至十四人。基本乐器有唢呐、笛子、板胡、二胡、三弦、琵琶及锣、钹、鼓等，最大的特点是在打击乐中使用了定律的‘十面锣’。”^①“十面锣”是由传统的“五面锣”逐步革新发展的，是奉化吹打中最具特色的乐器。另外作者对该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奉化市萧王庙小学已将“奉化吹打”引入学校传承的情况。

殷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嵊州吹打为个案》^②主要从西乡派系的长乐镇农民吹打乐队进行研究，并与东乡派系进行比较，寻找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文中提到长乐农民的嵊州吹打既能独立演奏，也能与其他民间艺术形式表演有机结合，根据不同场地、不同场合有选择地调整乐队规模，既能在室内，也能在室外。乐队的编制也没有严格的要求，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表演，参加人员的规模大小也不同，但有些主奏乐器却是相对固定的。长乐农民吹打乐以吸气箭号以及独特的吸气演奏法为标志。演奏曲目有嵊州地方特色的传统曲目，也有一些戏曲曲牌的移植曲目，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自创曲目。作者指出对于嵊州吹打的保护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重申报、轻保护；第二是传承后继无人；第三是缺乏组织管理；第四是资金

^① 傅珠秀. 奉化吹打[J]. 浙江档案, 2008(05).

^② 殷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嵊州吹打为个案[J]. 艺术教育, 2013(10).